

肯尼亚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殖民话语的延续*

齐腾飞 高良敏

【内容提要】自 1963 年肯尼亚独立,英国殖民主义在政治意义上已经终结,但土地制度却没有经历过变革。在此背景下,肯尼亚社会涌现出一批新土地精英,攫取了独立带来的土地利益,引起整个社会对独立的反思。本文通过白人高地殖民历史、与土地相关的社会结构数据和基利菲郡新土地精英故事,阐释新土地精英的崛起过程,剖析殖民话语得以延续的深层逻辑。研究发现,新土地精英获取土地主要依靠两种方式,一是“继承”白人;二是利用政府推行的土地安置计划。这两种方式的实施激活了英国长期殖民给肯尼亚人带来的苦难记忆,并由此形成了殖民话语依赖。

【关键词】新土地精英;殖民话语;土地制度;内部殖民主义

【作者简介】齐腾飞,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全球特大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东非土地问题(深圳,518000);高良敏,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东非健康和中非农耕文化(北京,100084)。

“遥想独立那晚,我们聚在中心场地,点起篝火,手舞足蹈,敲鼓歌唱,彻夜狂欢。那时的我们天真地认为,独立就是希望,就是无限可能。沿海别墅将是我们的,白人和阿拉伯人占有的土地将归还我们,我们将过上跟他们一样的幸福生活”,基利菲郡富比尼村(Kilifi County Fumbini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东非农耕文化互动与发展的人类学研究”(19BSH1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Village) 长老谦戈 (Chengo) 回忆起当年庆祝独立的场景。可眺了眺不远的海边别墅, 转头望了望简陋的草房和龟裂的土地, “独立是独立了, 土地也分配了, 可我们却不是受益者。很多时候, 我就想, 我们天天 ‘Uhuru’ ‘Uhuru’ 地喊着, 可是我们真的 Uhuru 了吗? 怎么觉着跟英国殖民时期也没啥区别呀!”^① 谦戈叹息一声, 低下了头。

以上是笔者在基利菲郡田野调查时遇到的一幕。2019 年, 为了研究肯尼亚土地纠纷问题, 笔者前往东海岸的基利菲郡从事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调查。在访谈过程中, 当地民众时常谈到对独立的期待与现实的落空。这样一种表述方式的重复出现仿佛在证明长老谦戈对国家独立的质疑并非孤案。肯尼亚社会流传着一则政治笑话: 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 (Jomo Kenyatta)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独立, 给新出生的儿子起名 “Uhuru”。1968 年, 因政治斗争失败退出政府的开国副总统奥金加·奥廷加 (Oginga Odinga), 撰写了一本书——《尚未独立》(Not Yet Uhuru)。书名一语双关, 既暗讽了政治对手, 又质疑了独立本质。问题是肯尼亚业已独立 60 年, 为何殖民话语依旧在社会延续?

一 从传统殖民主义到内部殖民主义

第三世界的人民在反抗殖民斗争和获得独立之后将面临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独立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和自由。^② 而今, 传统殖民主义残余依旧存在, 还衍生出两种殖民主义变种, 一者是全球资本主义引领下的新殖民主义, 二者是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内部殖民主义。

“内部殖民主义” (Internal Colonialism) 概念产生于二战后, 将此概念学术化的是墨西哥社会学家冈萨雷斯·卡萨诺瓦 (González Casanova) 和人类学家鲁道夫·斯塔文哈根 (Rodolfo Stavenhagen)。两位学者运用 “内部殖民主义” 来解释印欧混血儿与印第安人在经济结构中的主导与从属关系。^③ 之后, 这一概念被用来阐释民族国家内部各地区、各民族之间

① 独立日是 1963 年 12 月 12 日; “Uhuru” 是斯瓦希里语词, “独立” 之义; 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② [法] 法农: 《全世界受苦的人》, 万冰译, 译林出版社, 2005, 第 96 页。

③ Casanova Pablo Gonzalez, “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4, No. 1, 1965, pp. 27-37.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并着重强调国家内部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剥削。虽然此概念产生于二战后,但其内涵早在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葛兰西《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得到呈现。^①列宁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市场时认为其他西方国家可以去海外殖民,寻找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最薄弱的一环的俄国情况与之不同。俄国疆域辽阔,内部市场已经由边疆建立起来,殖民主义是通过操纵内部中心与边疆的关系实现的。^②葛兰西分析的意大利同样是一个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的国家,南方与北方社会发展不平衡。北方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导南方,还像对待海外被殖民者一样,将南方人贬损为野蛮人。^③

政治边界是划分新殖民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的标准,前者强调剥削和压迫来自民族国家之外,后者则来自民族国家内部。但是,内部殖民主义并不完全被民族国家内部的空间地理所框定,其思想传承、权力结构继承和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在国际互动因素。从学术内涵看,内部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种族主义批判、反殖民主义存在继承关系,但其理论建构主要来自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依附理论认为,低收入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其经济与富裕国家存在一种依附关系,后者凭借全球资本主义对前者展开剥削。^④类比依附理论,内部殖民主义将富裕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互动转化为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文化群体的互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不同文化群体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是殖民历史造成的,这一权力结构依旧主导着如今国家政策的偏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基础设施的依附性:在工业模式方面,跨国企业控制着有活力的工业部门;在上层架构方面,国内官僚和工业资本家与外国利益绑定在一起。如此,依附性基础设施在功能上相当于一个殖民机构。^⑤

另外,内部殖民主义也被发达国家的学者用于解释其内部的族群剥

①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10~211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2012,第229~233页。

③ [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第226~251页。

④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The Consumption of Dependency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2, No. 3, 1977, pp. 7-24.

⑤ David S. Walls, "Internal Colony or Internal Periphery? A Critique of Current Models and an Alternative Formulation", in Helen M. Lewis et al., eds., *Colonialism in Modern America: The Appalachian Case*, Boone, NC: Appalachian Consortium Press, 1978, pp. 319-349.

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内部殖民主义契合了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风行一时。布劳纳（Blauner）认为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与亚非拉各国的反殖民主义斗争非常一致，可以运用殖民主义话语分析美国社会如何被塑造成剥削黑人的殖民地。^①除此以外，吉尔伯特（Gilbert）、约翰·斯通（John Stone）等人将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扩展到美国落后地区和印第安人群体。赫克特（Hechter）锁定英国边远地区的凯尔特人，认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凯尔特地区遭遇内部殖民主义的原因在于工业化导致的不平等。由于地理等偶然的因素，工业化以来中心地区与偏远地区存在发展鸿沟，不同地区和人群存在隔阂，经济优势族群利用现存社会分层系统稳定和垄断发展优势，与之前海外殖民地的控制策略如出一辙。^②近年来，不受约束的全球资本正在加剧民族国家内部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内部殖民主义越来越被视为分析此类发展模式的工具。

综上，内部殖民主义呈现疆域内部经济优势地区和族群对相对弱势地区和族群的剥削和压迫，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家内部，也在于国际资本的介入。亚非拉学者之所以提出或使用内部殖民主义，源于漫长的殖民历史导致的殖民话语依赖，此概念易被接受和传播。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类比殖民压迫与国内差距，容易导致民族中心主义、分离主义，乃至国家认同的消解。

与拉美社会不同，肯尼亚没有孕育出作为统治者的混血儿群体，但两者受西方殖民主义影响的本质相同，西方殖民主义依旧是内部殖民主义的渊源。殖民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凭借其军事和其他方面的优势占据土地，奴役土著居民劳动，为其工业生产和贸易提供原材料。占据土地采用的策略是土地异化政策（Land Alienation）^③，即抹去原有土地的权利关系，从而为获取土地披上“合法”的外衣，具体操作方法为“宣布占领无主荒地”“声称部落领袖让渡”“租赁或购买”。^④二战后，日不落帝国国力衰落，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1952~1960年肯尼亚境内爆发

① Blauner Robert, *Racial Oppress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pp. 19-50.

② Hechter Michael,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164-207.

③ 根据 Etymonline, alienation 来自古法语 alienacion, 指的是“所有权转移, 疏远行为”; 来自拉丁语的 alienationem, 则为“转移、交出、分离”之意。土地异化, 指的就是剥离原有土地上的权利。

④ Judi Wakhungu and Christopher Huggins, eds., *Land Tenure and Violent Conflict in Kenya*, African Centre for Technology Studies, 2008, pp. 1-24.

了争取“土地”和“独立”的茅茅运动。茅茅运动最终被镇压，但英国政府也付出了高昂的军费代价。^① 在国际压力、国力衰退和殖民地反抗的背景下，英国与肯尼亚政治精英经过三次兰开斯特宫（Lancaster House）谈判，达成了保护英国经济利益换取政治独立的方案。^② 兰开斯特宫会议确定的宪政原则是现有土地产权必须得到保护，政府如果征用私人土地必须基于公共目的，同时给予公正补偿。土地买卖问题，必须基于双方意思自治。^③ 肯尼亚独立后，英国殖民主义在政治意义上已经消失，而政治独立的妥协性对应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畸形。滞留的欧洲人依旧占有土地，离开的欧洲人出售、赠送或抛弃土地，这扰乱了肯尼亚社会的土地分配秩序，加剧了土地冲突，将肯尼亚拉进了内部殖民主义的泥潭。本文基于在基利菲郡搜集的田野材料，借助文本档案和观察访谈资料，描述新土地精英的崛起路径，阐释西方殖民主义与内部殖民主义之间的承接关系。

二 新土地精英与土地制度延续

新土地精英，是相对旧土地精英而言的，旧土地精英指的是殖民时期在肯尼亚经营土地庄园的欧洲移民，新土地精英是肯尼亚独立后获取土地利益的黑人。土地精英群体的转变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的本质区别。旧土地精英的产生得益于殖民政府针对欧洲白人的移民和授地政策，而新土地精英的崛起源于对前者的“继承”。

土地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白人高地”（White Highlands）问题。白人高地位于肯尼亚西南部，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占肯尼亚总土地面积的5%。之所以被称作白人高地，是因为这片土地的产权只属于白人，其他族群，如亚洲人和黑人无权染指。这片肯尼亚最为肥沃的土地，其归

① 英国承受了5500万英镑的军费，参见 Gerlach Christian, *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3.

② 兰开斯特宫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区，毗邻圣詹姆斯宫和白金汉宫，曾是王宫建筑群的一部分。作为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办公场所，兰开斯特宫见证了英国近代政治风云。

③ UK Parliament Hansard Kenya, “British Farmers”, Vol. 703, “Debated on Friday 4 December 1964”,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1964-12-04/debates/9f9758e3-fd13-4e03-8383-5571e10150f4/Kenya_\(British_Farmers\)](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1964-12-04/debates/9f9758e3-fd13-4e03-8383-5571e10150f4/Kenya_(British_Farmers)).

属历史见证了西方殖民主义向内部殖民主义的转化。

殖民前，白人高地上的大部分土地属于马赛人（Maasai）。19世纪末，牛瘟、干旱、天花肆虐，导致90%的牲畜和2/3的人口死亡，马赛人实力大损。^①与此同时，基库尤人（Kikuyu）蚕食其地，马赛内部兄弟阋墙，莱邦（Laibon，仪式领袖）莱纳纳（Lenana）选择与英国殖民者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1898年，莱纳纳被东非保护国政府任命为马赛首席大酋长。之后，英国殖民者强迫莱纳纳签署了两个租期为999年的条约，即1904年和1911年的《马赛协议》，通过租赁方式让渡土地。1904年《马赛协议》创造出两个保留地供马赛人居住，一个是莱基皮亚（Laikipia），另外一个则是恩贡（Ngong），规定只要马赛人存在，就可以永久占据保留区，不允许欧洲人或其他定居者占领土地，但马赛人需要撤出裂谷地区。随着欧洲移民进入，土地需求增加，殖民政府侵占马赛人保留区，催生了1911年《马赛协议》，将马赛人压缩到南部的卡贾多郡（Kajiado）和纳罗克（Narok）。^②在军事压力下，马赛部落选择南迁。南迁过程中，马赛人遭受大量的牲畜和人员损失，而南迁后的土地贫瘠，游牧经济自此一蹶不振。西方殖民主义改变了土地的占有格局，为内部殖民主义创造了前提条件。

20世纪初，拖拉机、推土机等农业机械的大规模推广还不普遍，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无论是最初移民肯尼亚的白人群体，还是英国一战退伍士兵，数量有限，且无意从事稼穡劳作。发展种植业需要劳动力，游牧的马赛人显然不合适，而位于白人高地附近从事农耕的基库尤人成了理想的“合作对象”。殖民者的这一选择，既为繁荣殖民地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之后的内部殖民主义提供了主体。作为耕种的回报，基库尤人可以居住在农场，获得一块土地种植庄稼和饲养牲畜。基库尤人成为“白人高地”上的“租客”。协作初始，因为土地和劳动力存在互补关系，欧洲移民与基库尤人相处较为融洽。好景不长，两者关系开始恶化。一战后，农业机械大量涌入肯尼亚，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此时白人高地上的基库尤人数量增长，垦荒规模扩大。英国农场主和基库尤人不断削弱的互补性酝酿着矛盾，最终导致“茅茅运动”。运动最终被

^① Christine Nicholls, “Rinderpest Brings Disaster in the 1890s”, *Old Africa*, November 25, 2017.

^② A. W. Kabourou, “The Maasai Land Case of 1912: A Reappraisal”,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No. 17, 1988, pp. 1-20.

平息,但英国政府难以维系殖民统治,决定给予肯尼亚独立权。

肯尼亚即将独立的消息引起欧洲移民的恐慌,毕竟其在肯尼亚社会的优先地位源于殖民政府。欧洲移民希望继续留在肯尼亚,但如果局势恶化,他们应该有计划出售农场,变现离开。英国政府出台了提供贷款支持的“百万英亩安置计划”(One Million Acre Scheme)。英国议会讨论此事时,针对农场大小采取了区别对待策略。1960年,3600个农场中,800个面积在2000英亩(1英亩=4046.86平方米)以上的大农场不动,保持现有土地占有格局,保持英国影响力;2800个200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总占地280万英亩,被决定用来出售。后因预算限制,英国将其中1000个“小农场”纳入计划,安置7万个非洲家庭。计划于1962年实施,大约120万英亩土地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独立前后,许多欧洲人出售了土地,离开了肯尼亚。^①百万英亩安置计划为内部殖民主义的主体提供了财力保障,这些主体主要是独立后的官员。独立政府官员主要来自基库尤人、卢奥人(Luo)、卢希亚人(Luhya)、卡伦金人(Kalenjin)、康巴人(Kamba)、恩布人(Embu)和梅鲁人(Meru)。由于卢奥人、卢希亚人、卡伦金人和康巴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分别在维多利亚湖东侧、肯尼亚西部、裂谷地区和东部内陆地区,白人高地上的大多数农场被基库尤人及其亲缘族群(即恩布人和梅鲁人)的政客们贷款赎买,并分配给了所在家族。

财力保障之外,殖民土地法律制度也为独立政府所继承,构成了内部殖民主义的制度保障。1963年之前,殖民政府推行土地异化政策,将非洲诸部落压缩在土壤贫瘠的“土著保留地”,将高产土地界定为“王室土地”(Crown Land),由总督代表英王直接控制,分配给欧洲移民。^②1963年后,殖民政府将尚未分配的土地移交给了独立政府,独立政府也继承和延续了原有的土地制度。“王室土地”改了一个名字——“官地”(Government Land),《官地法》(Government Land Act)就继承了《王室土地条例》(The Crown Land Ordinance)的精神。“土著保留地”也改了一个名字,叫作“信托土地”(Trust Land)。信托土地本来应该代表传统

① UK Parliament Hansard Kenya, “British Farmers”, Vol. 703, “Debated on Friday 4 December 1964”,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1964-12-04/debates/9f9758e3-fd13-4e03-8383-5571e10150f4/Kenya_\(British_Farmers\)](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1964-12-04/debates/9f9758e3-fd13-4e03-8383-5571e10150f4/Kenya_(British_Farmers)).

② J. M. Klopp, “Pilfering the Public: The Problem of Land Grabbing in Contemporary Kenya”, *Africa Today*, Vol. 47, No. 1, 2000, pp. 7-26.

社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但1963年《宪法》对“信托土地”的认证条件过于苛刻，致使在实践中，“信托土地”往往被当作“官地”处置。^①殖民时期，殖民政府奉行“间接统治”，划定“土著保留地”后，很少干预保留地内部事务，任由土著按照习惯法处置。1963年《宪法》则将成文法适用权延伸到“土著保留地”，殖民土地制度得以进一步延伸。^②

在土地制度延续的背景下，新土地精英得益于旧土地精英。以基库尤人为代表的“租客”，或接受欧洲移民的馈赠，或向政府申请贷款，或因家族内有政府官员，一跃成为新土地精英。当然，通过这种方式成为新土地精英的是基库尤少数精英家族。与此同时，大多数普通农民表现迟钝，一者在于财力所限，不敢冒险贷款，毕竟一些冒险者发现耕作土地无法支付贷款，会陷入债务危机；二者在于他们秉持一种观念——花钱购买在传统上属于自己的土地不可理喻。独立初期的土地赎买运动，在社会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精英家族近水楼台，率先出击，承接了一部分西方殖民者的土地，导致肯尼亚土地占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见表1）。独立前，大农场都被欧洲人把持着，亚洲人（指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被排斥在外；而到了独立后的1970年，大农场主数量从2000人减到1800人，而非洲人则占了大农场主数量的一半。同殖民政府一样，独立政府依旧在土地政策上排斥亚洲人。权力与利益是一对孪生兄弟，借助权力，政治精英们摇身一变，成为土地精英，这也就解释了现在肯尼亚大农场几乎都归属政治精英家族。^③

表1 1950年、1960年和1970年肯尼亚社会结构（仅展示与土地相关人群）

	1950		1960		1970	
	数量（千人）	比例%	数量（千人）	比例%	数量（千人）	比例%
大农场主	2	0.1	2	0.1	1.8	0.1
非洲人					0.9	

① 土地认证需要在1963年5月31日前登记注册，由于时效和习惯法等问题，土著保留地内的大量土地并未登记。

② 1963年《宪法》208（11）的原文是“*No right, interest or other benefit under African Customary law should have effec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o the extent to which it is repugnant to any written law*”。

③ Branch Daniel, *Kenya: Between Hope and Despair, 1963-201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89-120.

续表

	1950		1960		1970	
	数量(千人)	比例%	数量(千人)	比例%	数量(千人)	比例%
亚洲人						
欧洲人	2		2		0.9	
农业小资产阶级	71.9	4.8	97.2	5.2	234.2	9.5
农业无产阶级	1035.7	68.9	1203.2	64.9	1202.3	48.8
……						
合计(仅男性劳动力)	1504.2	100	1853.6	100	2465.8	100

资料来源: Berg-Schlosse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ses of Politics in Kenya: A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9; Kenya Statistical Abstracts, 1981-1986。

与独立政府和基库尤大地主承接白人土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赛人。独立前夕, 马赛代表向英国殖民政府请愿, 要求归还土地, 被英国殖民政府以将权利和义务移交独立政府搪塞。2004年, 即1904年《马赛协议》签字百年, 马赛人向现政府请愿, 要求归还百年前协议上租赁的土地, 并对大规模迁徙时造成的牲畜损失和人口死亡进行赔偿, 得到的是警察的暴力驱散。当时的土地与安置部部长声称, “租赁期限是999年, 不是99年, 建议马赛人899年后再次提出主张”。^① 那么百年前马赛领袖莱纳纳签署的协议有效吗? 尽管莱纳纳是“莱邦”, 但只是仪式领袖, 没有权力支配他人土地。之后他被冠以马赛首席大酋长的头衔, 如同“马赛王”, 仿佛拥有了变更土地占有方式的权力。但事实上, 首席大酋长职位是英国人授予的, 并非马赛人内部制度的产物。另外, 英国人也未必认可酋长拥有土地决定权。英国法学家梅因已有相关阐释, “如果因为首领逐渐得到承认, 便认为他是全部或大部分部落土地的合法拥有者, 并可以改变传统的土地占有和耕作方式, 那是对实际情况的严重曲解”。^② 但是, 按照法律形式主义, 马赛人陷入了一种悖论, 如果承认《马赛协议》则需要等待899年; 如果不承认《马赛协议》则很难证明白人高地之前的土地权属。即便独立政府承认《马赛协议》, 土地在名义上归马赛人所

① Rasna Warah, “Betraying the Maasai”, *The East African*, October 5, 2008, <https://www.theeastafrican.co.ke/tea/magazine/betraying-the-maasai-1292256>. Accessed 2023-3-20.

② [英] 梅因:《早期制度史讲义》, 冯克利、吴其亮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第126-127页。

有，但是近千年的土地无效占有无异于丧失了所有权。西方殖民者提供的先发地位、财力和制度保障为基库尤大地主奠定了内部殖民主义主体的地位，而马赛人则成了内部殖民主义的客体。百年前，英国殖民主义剥夺了马赛人的土地；尽管政权更迭，但内部殖民主义承接了历史，延续土地剥夺状态。

三 经济强势民族的流动与土地占有

上文阐释白人高地问题时，聚焦点在精英家族少数群体身上，但也折射出基库尤人在内部殖民主义结构中的强势地位。在白人高地和其他地域，基库尤人都有着强势地位。首任总统执政期间（1963~1978年），基库尤人的区域流动和土地投资颇为频繁。这些流动的群体，不仅包括基库尤精英家族，也包括基库尤普通有产阶层。基库尤社会之所以会产生领先其他民族的有产阶层，得益于斯温纳顿计划（Swynnerton Plan）。^①

殖民时期，英国殖民政府担心土著种植经济作物实现经济自由而无法为白人农场提供劳动力，不允许土著私自种植咖啡、茶叶、棉花等经济作物。在这种情况下，土著普遍贫困，没有产生有产阶层的条件。“茅茅运动”后，殖民政府为减弱土著对抗，推出了增加土著社会发展机会的斯温纳顿计划。斯温纳顿计划在土地产权、贷款、经济作物种植等方面给予土著机会，计划实施后，许多非洲家庭能够拥有一块明确产权的土地建设小农庄，既供养了家庭，也提升了生产效率。^② 1955年，小规模农庄的产值是520万英镑，而到1964年，增长到1400万英镑。^③ 由于肯尼亚的优质土地主要集中在白人高地，白人高地的农业产值占整个国家的八成，斯温纳顿计划实施后，身处白人高地的基库尤人成为肯尼亚最为富庶的民族，乡村也出现了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④

① 该计划因英国农业部官员罗杰·斯温纳顿（Roger Swynnerton）提出而得名。

② Collier Paul and Lal Deepak, *Labour and Poverty in Kenya, 1900-198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p. 44-45.

③ Ochieng' William Robert, "Structural & Political Changes", in Ogot Bethwell Alan, ed., *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Kenya, 1940-93*, Oxford: James Currey, 1995, pp. 83-109.

④ Atieno-Odhiambo and Elisha Stephen, "The Formative Years: 1945-55", in Ogot Bethwell Alan, ed., *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Kenya, 1940-93*, Oxford: James Currey, 1995, pp. 25-47.

国家独立减少了对土著跨区流动的限制，而独立政府之后推行的土地安置计划为基库尤人全国赎买土地创造了机遇。也许政府本意是通过土地安置计划给予土著明确的土地产权，无意扩大民族之间的差距，但具有先发优势的基库尤人通过各处买地成为内部殖民主义的主体。在此，需要了解的一点是，土地安置计划并非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而是需要支付货币进行赎买。只有支付购地款，土著才能通过土地登记造册获得地契，合法占有土地。^①在基利菲郡，土地安置计划涉及的土地是独立政府从殖民政府继承的官地，这些官地除了官员群体和有财富积累的村落长老外，当地主体民族米基肯达人(Mijikenda)中的绝大多数几乎无财力赎买。当时，有财富积累的基库尤人有能力支付购地款，成为基利菲郡的小地主。

基利菲郡最为古老的俱乐部是基利菲会员俱乐部(Kilifi Members Club)，最豪华的俱乐部是水塔俱乐部(Mnarani Club)。基利菲会员俱乐部建于20世纪30年代，隶属殖民政府，参照蒙巴萨俱乐部惯例，只招待白人，黑人除当侍者外，概不能进。独立后，俱乐部移交给了基利菲郡政府，后转让给卡比瑞(Kibiru)经营。卡比瑞是基库尤人，家乡在肯尼亚山附近。30多年前，卡比瑞来到基利菲，以低廉的价格购置了600英亩“官地”种植腰果发家致富，随着其经营业务的增多，其成为基利菲人嘴边的“女首富”。会员俱乐部对岸，同样位于基利菲湾岸边朝向印度洋的水塔俱乐部，提供帆船、住宿、餐饮、音乐等服务，其费用远超当地民众的生活承受能力。而水塔俱乐部的建造得益于土地安置计划。1963年，内罗毕肯雅塔家族的成员在印度洋出海口购买了大片土地，为发展旅游业，修建此俱乐部。^②

基库尤人是肯尼亚的合法民族，其在肯尼亚境内购置土地的行为恪守法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尽管基库尤人的到来激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然而其合理合法的赎买土地行为让当地人苦有言。在一国范围内，不

① Waaijenberg Henk, *Land and labour in Mijikenda Agriculture, Kenya, 1850-1985*, Leiden: African Studies Centre, 1993, pp. 20-23.

② 被访谈人: Kibiru; 访谈时间: 2019年1月。

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致使相对发达地区或富庶民族可以凭借优势地位通过法律和经济机制从相对落后地区和贫困民族中汲取经济利益。这种关系经常被当地民众视作殖民时期白人与黑人关系的翻版。相比于耕地和牧场，俱乐部等休闲设施的归属对内部殖民主义而言，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基利菲郡沿海别墅、餐馆和俱乐部，其所有权除了归欧美商人外，主要归代表内部殖民主义的基库尤人、西方殖民者后裔和阿拉伯人。这些休闲娱乐设施几乎霸占着所有地势平缓且覆盖银沙的海滩，增加了当地民众前往海边休闲的交通和时间成本。这样一种沿海景观配置不停唤醒基利菲民众的殖民记忆，也不停引导其对现状展开殖民的想象力。

与内陆相比，位于沿海的基利菲，其殖民历史更为复杂。独立前，基利菲土地名义上属于桑给巴尔苏丹国，实际属于英国殖民政府。这意味着基利菲的土地殖民历史不仅涉及西方人，还涉及从10世纪起就开始在东非沿海殖民的阿拉伯人。而今基利菲的土地占有格局，既受长时段的殖民历史影响，也与独立初期的社会骚动相关。

独立初期，米基肯达人靠“自力救济”的方式获取了部分土地利益。基利菲郡治所附近在独立前有三个大农场主，分别是英国人威尔森（Wilson）、英国人密克文（Meckwan）和阿拉伯人马吉德（Majid），他们都拥有4000英亩以上的种植园。1963年底，肯尼亚独立，基利菲东海岸阿拉伯人的土地利益靠肯尼亚与桑给巴尔苏丹国签署的协议获得保障。1964年，桑给巴尔岛发生革命，政权被推翻，阿拉伯人失去了保护伞。米基肯达人发生群体暴动，砍了阿拉伯农场主的头，私分了土地，其他阿拉伯人的土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瓜分。独立政府对此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私分阿拉伯人土地的做法。受“砍了阿拉伯农场主头”的刺激，密克文担心事故发生返回英国，将土地留给了基库尤管家乔客亚（Johnkia）打理。乔客亚希望实现安全和财富的两全，将土地细分出售。威尔森选择留下，而今其后代继承的基利菲种植园（Kilifi Plantations）成为当地最大的种植园，专门从事乳制品加工、剑麻制造业和园艺管理，也是东非最大的原料奶生产商之一。^①

^① 被访谈人：Chengo, Juma, Amina 等；访谈时间：2019年2月。

独立初期, 基利菲郡三个大农场的产权变动映射出该地米基肯达人与各种殖民主义的复杂关系。如上文所述, 基库尤管家的“近水楼台”显示了其成为内部殖民主义主体的条件。对米基肯达人而言, 阿拉伯人的土地意味着古代阿拉伯人殖民主义的残余。当阿拉伯人势力强盛之时, 米基肯达人无法染指土地, 而随着肯尼亚独立和桑给巴尔苏丹国垮台, 维持土地产权的外部强力瓦解, 阿拉伯人丧失了维持现状的能力, 许多土地被瓜分。殖民时期, 英国人占据农场意味着存在近代殖民主义, 独立后, 这种殖民主义转化成了内部殖民主义。转化的条件是肯尼亚宪法所保障的“双重国籍制度”。

独立初期, 尽管英国农场主密克文受“砍了阿拉伯农场主头”的刺激选择回国, 但当地并未发生过针对英国人的血腥冲突。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独立初期, 肯尼亚军队依旧被英国人控制, 英国人的土地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以反殖民为旗号, 基利菲民众曾向独立政府请愿要求收回英国农场主的土地, 但独立政府劝导民众遵守独立建国契约。殖民时期, 绝大部分土地是官地, 租约是99年, 到期归还当时政府。然而, 租约协议因殖民者后裔的身份问题发生了改变。

2018年, 基利菲种植园历时99年的租约到期, 民众则向郡政府请愿, 要求收回种植园, 分配土地。然而政府的回复是, “基利菲种植园是本地少有的大公司, 每年生产和出口大量的剑麻和乳制品, 创造了300多个工作岗位。同时, 种植园里面办了七所中小学, 接纳了一些企业, 拉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应该继续持有”。种植园附近三个村落的村民不忿, 发动群体事件, 占领农场, 丈量土地, 之后瓜分。农场主克里斯托弗(Chrisiopher)招来警察驱逐, 并逮捕了带头的14位村庄长老。法庭之上, 克里斯托弗证实自己拥有肯尼亚国籍, 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是肯尼亚人, 应该享有永久产权, 而非99年, 更不应该被以殖民者相待。村民愤愤不平, 却无可奈何, 毕竟肯尼亚宪法承认双重国籍制度。^①

双重国籍制度能够拉动国外投资, 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 成为诸多

^① 被访谈人: 暴动村落长老 Francis; 访谈时间: 2019年3月。

国家提振经济的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双重国籍制度打通了国外投资者享受国民待遇的渠道，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国外投资者很容易抢占相对贫困国家的资源。而在身份认同上，投资者可以在功利主义和文化认同的纠葛中随时随地变化。这种弹性的身份制度成为殖民者后裔的保护伞，将西方殖民主义转变成内部殖民主义。

独立初期社会处于骚乱状态，政府对米基肯达人私分阿拉伯人的土地持默认态度，秩序稳定后通过集体暴动获取土地不具备可行性。在骚乱中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通过诉讼手段卷土重来，又增加了土地产权的不确定性。与西方殖民者后裔不同，至少从 10 世纪开始，阿拉伯人就陆续在东非海岸定居，与当地黑人通婚，共同孕育出混血的斯瓦希里人和独特的斯瓦希里文明。他们早已融入肯尼亚社会，没有阿拉伯国家的国籍，对黑人将自己描绘成外国人和殖民者从而抢占土地的做法不以为意。尽管在社会骚乱之时，许多阿拉伯人丧失了土地，但保留了地契。凭借原有地契，阿拉伯人展开了时至今日依旧没有结点的法律诉讼。法律诉讼持续时间长，结果往往不是终审判决，致使土地产权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不仅贬损了土地长期投资和收益的价值，还不断刺激着米基肯达人和阿拉伯人在殖民历史中的创伤。

相对本土米基肯达人而言，基库尤人、欧洲殖民者后裔和阿拉伯人在政策倾斜、经济优势和合法地契方面皆处于优势地位。基库尤人凭借土地安置计划前来购地，欧洲殖民者后裔凭借身份的流变续占土地，阿拉伯人手持地契前来讨地，三种情况同时在基利菲出现，激活了米基肯达人比较历史与现时殖民主义的动力，并实现了对古代阿拉伯人、近代英国殖民者和当代基库尤人的深度绑定。

结 语

二战后，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运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剥削，但是这些国家内部依旧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传统的阶级理论无论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标准，还是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标准，都未探讨阶级和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内部殖民主义弥补了这一遗憾。但需要强调的是，内部殖民主义的解释路径存在缺陷，一者，内部殖民主义忽视了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

统治民族基库尤人剥削和压迫马赛人或米基肯达人的断言是片面的，基库尤人内部也有很多穷人，他们没有能力去剥削其他民族，同样马赛人或米基肯达人内部也存在阶级分化；二者，内部殖民主义没有提出区分内部殖民主义关系与阶级关系的标准，如果说权力精英与平民阶层存在剥削与压迫关系的话，那不应该是殖民关系，而是阶级关系。

话虽如此，然而回溯历史、对照现实，殖民话语的延续却显得更为契合。肯尼亚国家独立是英国政府让渡的，独立宪法是与英国政府协商的，政治精英赎买土地的贷款是英国政府提供的，政治精英巧取豪夺土地的产权缺陷是殖民者遗留的，基库尤人比其他民族富庶是斯温纳顿计划创造的，肯尼亚土地占有现状是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这也就是说，肯尼亚国家独立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政治独立，一种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独立却未对土地制度进行彻底变革，这对被英国殖民统治日久的普通民众而言，无异于殖民场景的再次上演。殖民主义话语延续的实质在于现有的土地占有格局激活了英国长期殖民给肯尼亚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记忆，并由此形成了殖民话语依赖。

【责任编辑】胡洋

Characteristics and Challenges of Ethiopia's Development Mode

Guo Fenglin, Zhai Yue / 75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represented by East Asian countries is considered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Ethiopia creatively adopted a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 established an ethnic-based democratic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olitical strongman and a strong political party, and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through national plans, show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odel. However,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thnic groups and the slowdown of economic growth, Ethiopia’s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faces big challenges, which requires deeper construction to its state capacity.

Keywords: Ethiopia; Developmental Stat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Rise of New Landed Elit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Colonial Discourse in Kenya

Qi Tengfei, Gao Liangmin / 92

Abstract: The land system has not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since Kenya’s independence in 1963, although British colonialism had left in a political sense. The new landed elites who capture the land benefits of independence have emerged in Kenya, and this has caused Kenyan society to rethink independence. This paper draws on White Highlands history, social structural data related to land, and stories of new landed elites in Kilifi to explain the rise of new landed elites and the underlying logic that perpetuates the colonial discourse.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to acquire land by new landed elites: ‘inheriting’ Europeans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government’s Land Resettlement Project.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se two approaches activated the memory of suffering by British colonization and created a pathway of colonial discourse.

Keywords: New Landed Elites; Colonial Discourse; Land System; Internal Colonialism

Influencing of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n Criminal Law by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Guo Jiong, Yi Kexin / 107

Abstract: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spiritual and cultural wealth created and passed down by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Africa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Its principles of punishment and rules of criminal law exhibit a unique charm and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order of traditional African societies. In the 1990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by invoking the concept of Ubuntu and the recognition of customary law as a source of criminal law in the constitution marked the resurgence of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outh African criminal law and began influencing the law that had been damaged by colonial rule and racial segregatio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South Africa has been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Ubuntu and customary law in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foundation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South African criminal law as well as creat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ystem of punishment and criminal offenses in contemporary criminal law.

Keywords: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South African Criminal Law; Ubuntu; Customary Criminal Law

Cattle Culture of Karamoja and Its Aberrance: A View of Understanding Conflicts of Africa

Wang Tao, Li Haozhe / 125

Abstract: The Karamoja's cattle-centric activities developed a unique cattle culture.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Karamoja people, whether it is to obtain power, exercise power, or transfer power, cattle are requisite. It is even regar-